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中美两国文学中的 地域主题研究

**A Thematic Study on Regionalism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孙宏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中美两国文学中的 地域主题研究

**A Thematic Study on Regionalism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孙宏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 / 孙宏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6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00-5144-4

I. 中… II. 孙…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美国
IV. I206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483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朱云奇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5144-4

定 价: 2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作者简介

孙宏教授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育管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后并获得第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及质量保证体系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孙宏教授近年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 30 余部,如“《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外国文学评论》2005 年),“‘石墙酒吧造反’前后同性恋文学在美国的演变”(《外国文学研究》,2006 年),“Pound’s Quest for Confucian Ideals: The Chinese History Cantos”(*Ezra Pound and 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年),《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他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凯瑟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批评经验”。

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旗帜， 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总序

纪宝成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党中央号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更大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高层次建设人才成长的摇篮，在党中央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形势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67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发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总书记语，参见《光明日报》2002年4月29日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拿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文化成果，为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文化（含文学、语言、翻译理论、历史、哲学等）研究，属于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外国语学院除了承

担全校的外语教学外,还设有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各专业分别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高学历层次、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发展后劲很强的学术梯队;外国语学院学者、教授们具有直接接触最新外文资料和信息优势,应该在向今人学习、向古人学习、向国人学习、向洋人学习的基础上,在建设理论创新体系、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方面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旨在了解并进入世界学术研究最前沿、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外国语学院将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分期分批、有计划地撰写出版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外国文化、外国文化理论、中外语互译理论、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历史、外国哲学、外国社会学等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学术专著。

这些专著虽然角度各异、文笔不同,但相信爱好外国语言、文学、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知识的朋友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特别是书中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写作手法,富有启发,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读书可以怡情,可以添彩,可以长才。”如果“文库”能在这几个方面或其中一个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最后,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者、教授们与全校各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一道,肩负起历史重任,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旗帜,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2004年3月31日

(总序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言

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既需要对中外文学关系、中外文学交流进行研究,也需要对中外文学的异同和契合做深入具体的阐述,力求以小见大,得出有实质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其研究成果必将加强异质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孙宏博士的专著《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是这方面很成功的一个尝试。

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业已形成的今天,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对于中美两国文化、宗教、艺术、历史等方面异同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广大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而美国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当然很大。但是,中美两国又有着国家幅员辽阔、人民勤劳向上等共同点,中美两国文学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方面,特别是在表现自然与人文的主题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又为二者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从地域这一角度对中美两国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确实抓住了要领,有利于我们对近百年来的中美两国文学进行概括和总结。

从马克·吐温到薇拉·凯瑟、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作家描写各地风土人情的创作层出不穷。从鲁迅到沈从文、老舍、黄春明和朱自清,随着五四运动开创新文化之后在中国涌现的地域文学作品更是异彩纷呈。在对中美两国文学的深入探讨中,这部专著涉及了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三种文学体裁,考察了都市、小镇和农村这三类在城市化发展程度方面水平悬殊的区域。从地理区域上来看,这部专著一方面论述了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薇拉·凯瑟笔下的内布拉斯加草原、西奥多·德莱塞笔下的芝加哥和纽约、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俄亥俄州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的新英格兰等美国的广阔地域,另一方面论述了鲁迅笔下的江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北京、黄春明

笔下的台湾、朱自清笔下的温州等中国的广阔地域。通过考察有关作品对这些地区个性鲜明的自然风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证明了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文学的发展中,地域这个主题一直是一个隽永的主旋律。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离不开它扎根其中、为它的生长发育提供养分的土壤。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学,尤其是中美这样的大国的文学来说,每个地域都对其整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源远流长的影响。《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文学的地域主题,揭示了人类的地域情感对其文学发展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从地域主题对中美两国的文学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增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的青年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从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在以往的文学评论中,我们非常关注一个时代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地域和作家及其作品之间的必然联系。孙宏博士的《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何其莘(教育部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10月25日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二章 凯瑟与沈从文的乡村小说	13
第三章 德莱塞与老舍的都市小说	77
第四章 安德森与黄春明的城镇小说	138
第五章 弗罗斯特与朱自清的地域诗篇	198
第六章 结论	236
参考书目	255
索引	272

第一章 总 论

文明是从蒙眛混沌、互不连贯的单一性
向明晰而连贯的多样性发展的一种进程。

——赫伯特·斯宾塞⁽¹⁾

1900年,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发出一句耐人寻味的感慨:“一个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把这个国家乡村的历史经过放大而写成的。”⁽²⁾当时正值世纪交接之际,此语出自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的政治家之口,可谓恰逢其时。今天,我们处于又一个新世纪刚刚开始的时代,回顾近百年来文学史,各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卷帙浩繁,我们应该如何加以总结、继承和研究呢?威尔逊的这段名言为我们在21世纪对各国的文学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一个国家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各处土地山川、田园厂矿的政治、经济实体。同样,一国的文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其中体现各个地域风土人情的文学篇章所组成的。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文学走过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个作家与之认同的地域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地域特色却一脉相承,在两国各自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一个具有无穷潜力的要素。

弗兰纳尔·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在评论这种地域特色时曾写道:“美国小说中最好的作品向来都是地域性的……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有共同的经历,有一种认同感,有可能以共同的眼光阅读一段小小的历史,最佳之作就会转移到那里,就会在那里停留得最长久。”⁽³⁾奥康诺的这段话发人深省,作家笔下的故事自然是要在某个地方展开的,然而这个地域的意义又不仅在于为小说提供了背景。在这些作品中,地域特色如此鲜明,其本身就形成一种充满魅力的主题。事实上,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地域情愫的表达古往今来,绵延不绝。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人类对于乡野故土的眷恋之情是有着深刻原因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对人类痛苦烦恼的根源进行了探究,他认为这种痛苦烦恼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自然界无比强大的力量,我们躯体趋于痛苦衰败的倾向,以及我们无论在家庭、社区,还是国家当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都常常存在的力不从心之感。”在给人类带来痛苦烦恼的这三个主要原因当中,虽然人们承认前两个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却往往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可以克服的,认为这种烦恼的根源既然是由人类自身一手造成的,自然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设法加以克服。人们总是相信,“我们的悲惨境遇大部分都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所谓的文明,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文明,返璞归真,我们就会感到幸福得多。”⁽⁴⁾

正是在这种返璞归真的强烈愿望驱使之下,人类在文明之路上走得离他们昔日赖以生存的农庄越远,他们就越需要在那乡野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理想境界。这种心理似乎颇有讽刺意味,难怪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改革的时代——从布莱恩到罗斯福》一书中对这种理想境界提出了质疑,称之为“一个关于土地的神话”⁽⁵⁾。这个神话的特点在于将田园生活设想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视乡村为善的象征,视城市为恶之渊藪。”⁽⁶⁾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的文学理论专著《关于批评之剖析》中对神话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神话是对于接近或者达到人类愿望的极限之处种种行为的一种模仿。”⁽⁷⁾弗莱给神话下的这个定义也说明人类将田园境界理想化的倾向是有其必然性的。在美洲,这个神话可以一直上溯到新大陆被发现的年代。正如利奥·马克思(Leo Marx)在《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当初,“放眼于一个清纯无瑕、未被玷污的西半球,人类似乎真的有望实现原先只是存在于诗歌境界中的种种幻想。”⁽⁸⁾

据《哥伦布四次航海文件选粹》记载,1492年哥伦布满怀喜悦地宣称这个新世界是“一片令人渴望,供人观赏,让人不忍离去的土地”⁽⁹⁾。时光荏苒,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个多世纪之后,这片土地虽然久已为欧洲的冒险家所瞩目,但其自然风貌还是完整无损的。1609年在新英格兰进行考察的英国探险家们依然称北美东海岸是一片处女地,一处乐园。在那里,“无论是在平原上还是在峡谷里,处处都有甘泉汨汨流过,宛如生物身

体上的天然脉络。还有丘陵山峦纵横交错,其间蕴含着无数的宝藏,尚待勘测开发。”⁽¹⁰⁾然而,在这以后的三百年间,随着人类对这片新大陆的开发,它的边疆被迅速而不断地往西部推移。到了19世纪末叶,即使是在数十年前还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城镇也仿佛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出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美国发生的这种田园与都市之间的冲突对20世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罗纳德·韦伯(Ronald Weber)在《中西部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在这段时间里“对美国现实生活最为深刻的解释都产生于这个国家农村的腹地以及它那具有磁石一般吸引力的城市”。⁽¹¹⁾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尽管多彩多姿,但是许多作品都在探索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共同的主题,致力于表现“昔日那种质朴自然的田园生活的湮然消失,乡村生活的平凡乏味,人们为了寻找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逃离乡村、移居城市的迁徙潮流,游子返乡时那种怀旧之情、负罪心绪和优越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¹²⁾与此同时,文学界所关注的核心地带也已经随着边疆的逐步向西推移而转向了广袤的西部地区。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由薇拉·凯瑟(Willa Cather)、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以及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ouis)等中西部作家创作的一系列出色著作。罗纳德·韦伯认为,对于这一时期而言,“中西部文学实际上就是美国文学。”⁽¹³⁾韦伯的这句话虽然不无夸张,却道出了地域主题在美国文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弗兰纳尔·奥康诺曾批评那些毫无血色、毫无生氣的小说,说它们“仿佛全部产生于某个用人工合成的处所,一个可以是任何地方,也许任何地方都不是的所在。”⁽¹⁴⁾沃纳·贝尔托夫(Warner Berthoff)在《小说与事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论文集》一书中对美国文学的得失所作的分析同样发人深省。他指出:“美国国内生活虽然充满力量,令人折服,但却往往缺乏一种明确的意义,并且过于追求形式多样,一味地注重标新立异,因而难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不具备任何易于辨认、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地方色彩’则为美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焦点,一个可以把这些纷纭复杂的内容表达出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它们一种客观判断标准的焦点。”⁽¹⁵⁾这种地方色彩植根于美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它证明“个性都

是无法在表层找到的……它不是由一些转瞬即逝的表面成分所构成,而是由一些持久存在的内在性质组成的。任凭有多少其他成分消失殆尽,它们都岿然不动,因为这些不朽的性质与真理息息相关。”⁽¹⁶⁾其实共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性而体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世界文学的瑰丽全景正是由描绘各个国家、表现不同地域的一幅幅文学画卷所汇集而成的。

利奥·马克思认为,美国作家在地域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真的想象,他们往往“把美国看成是一幅风景画,远在天边而又纯洁无瑕,是一个可以供人逃避现实、隐退于田园之间的良好场所。”⁽¹⁷⁾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地域文学作品,它从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角度对位于新大陆的这片国土进行观察与思考。它属于一个“后边疆时代”。正像雷金纳德·狄克(Reginald Dyck)在《对西部的重访与修正——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和莱特·莫里斯(Wright Morris)的〈平原之歌〉》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失去边疆时代的乐观主义和坚毅性格”。⁽¹⁸⁾艾略特·韦斯特(Elliott West)在《20世纪美国神话般的西部地区》一书的前言中将这种变化描述得更为具体。他认为,“这片曾一度被看作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理应永远阡陌无人烟的沃土,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狭窄有限。”⁽¹⁹⁾在后边疆时代的世界上,占据中心位置的是都市这个庞然大物,其纵向的标志是高耸入云、傲视大地的一座座摩天大楼,其横向的标志是朝着荒野伸展、蔓延,在它所经之处蚕食一切的一条条铁路。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作家中,西奥多·德莱塞撰写了《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薇拉·凯瑟撰写了《我的安东尼亚》(*My Ántonia*, 1918),舍伍德·安德森撰写了《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Winesburg, Ohio*, 1919),展现了美国各个地域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在《〈大街〉——卡罗尔·肯尼科特的反抗》一书中,马丁·巴考(Martin Bucco)对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Main Street*, 1910)作了评论,认为这部小说集中反映了“边疆时代与后边疆时代美国各种思想之间的尖锐冲突”⁽²⁰⁾,而凯瑟、德莱塞和安德森创作的几部作品所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尖锐冲突。

与此同时,地处东半球的文明古国中国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数千年,聪颖勤劳的中华先祖就已经开拓

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随着中国沉重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战舰上的大炮轰开,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和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化才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在这以后,列强又一再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1851—1864)和义和团(1900)。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这场规模空前的混战使西方列强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纷争,暂时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掠夺和瓜分,因而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欧洲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西方列强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故伎重演,再次无视中国的主权,把中国的领土作为供他们瓜分的鱼肉和交易的筹码。这些帝国主义者就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原来享有的特权一事作出决定时,不但没有将其交还给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然决定把这些特权转交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这一厚颜无耻的决定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在北京爆发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冲上大街,抗议的队伍浩浩荡荡,向使馆区进发,满怀激情地要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公使递交抗议书,但是这几位公使却都不见踪影。于是抗议者的队伍涌向了位于东单牌楼东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1876—1966)住宅。曹氏当时任交通部长,是北洋政府里一位身居要职的亲日派官员,而且作为前任外交次长,他对北洋政府作出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当学生们冲进曹家的宅院时,他已经从后门逃遁。于是群情激奋的学生们殴打了当时在曹宅内的几个人,并且放火烧了这所宅院,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火烧赵家楼”的壮烈章节。

五四运动不仅表达了爱国学生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连连失败的强烈抗议,而且体现了广大中国民众对北洋政府腐败无能的切齿痛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历年革新所蕴积的力量的一场总爆发。如同一块巨石被投入一片沉寂的水中,公众的愤怒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以上海为首的其他城市纷纷响应,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全国各界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几天之后,曹汝霖被罢免了职务。中国政府通电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拒绝在列强炮制的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并且为日后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

奠定了基础。但是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场抗议运动,郑振铎在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所写的导言里指出,五四运动“说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其实也便是文化运动”。⁽²¹⁾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春雨润泽之下,饱含着乡土气息的地域小说生根、发芽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创作形式。

随着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少以地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发轫者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吏家庭。他青年时代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以及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本留学,最初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来从事文艺工作,立志用进步思想改造国民精神。1918年初,鲁迅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入了当时这股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潮流。同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鲁迅继而撰写了《药》(1919)、《故乡》(1921)、《阿Q正传》(1921)和《社戏》(1922)等十几篇小说,并将这些作品编成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出版。1924至1925年,鲁迅又发表了《祝福》(1924)、《在酒楼上》(1924)和《伤逝》(1925)等11个短篇小说,后来将这些作品编成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彷徨》,于1925年出版。这一系列作品都是以绍兴一带农村为背景,往往以还乡为题材,脍炙人口。当时曾有学者撰文,对鲁迅的小说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论:“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惟一的乡土艺术家。”⁽²²⁾

这些作品以作者家乡一带地域为主题,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正像王德威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茅盾、老舍、沈从文》一书中指出的:“时光的流逝,新价值与旧价值的冲突;对已经逝去的纯洁年华或者童年生活的向往;与古怪、落后的乡村人物的相遇或重逢;对风俗习惯的观察,对即将来临的变化产生的焦虑所作的描述;以及思乡而又害怕还乡的种种复杂情感,凡此种种,都是属于人们称之为怀旧之情的一种既苦涩又甘甜的感觉。”⁽²³⁾在鲁迅的带动和影响下,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蹇先艾、裴文中、叶绍钧、许杰、鲁彦、许钦文、徐玉诺和王思玷等地域文学作家,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鲁迅不仅是以地域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引领地域文学批评的开拓者。正是鲁迅先生在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卷撰写的导言里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术语,用它来概括这种以地域为主题进行的文学创作:“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²⁴⁾

这种新兴的文学创作形式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二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期间,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都对他们所熟悉的地域以及那片土地上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描述。在这些以鲁迅的地域文学创作为先例,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的作家当中,我们首先应该提到沈从文(1902—1987)和老舍(1899—1966)。如果说鲁迅以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进行了地域文学创作的最初实验,沈从文和老舍等作家则用更长的篇幅,进一步对这一实践加以充实,使之日臻完善。沈从文的《边城》(1934)描绘了他的家乡湘西一带令人难以忘怀的秀丽景色;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展示了他的故乡北京城里的严峻现实。

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末,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域文学这个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欣欣向荣的文学创作形式旋即为抗战文学所取代。这种新形势下的战时文学要求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提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士气。1938 年 3 月 27 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该协会的《发起旨趣》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²⁵⁾

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1945 年走投无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此后中国的内战烽烟再度燃起,爆发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炮火的平息,出现了国共两党的政权隔着台湾海峡长期对峙的局面。因此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严酷的政治气候使得中国不可能诞生沈从文和老舍笔下那种风格

和水准的作品，中国的地域文学创作难以重现往昔的辉煌。

1948年岁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业已将北京围困起来，但是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力争和平解放北京的方针。这既是为了保全这座当时叫作北平的古都，使之免遭战火的破坏，也是为了保全城里的民众，包括这个文化中心的人才资源。国民党政府当时竭尽全力，动员各大学一些有影响的教授移居台湾。不过国民党官员原来以为可供他们应急之用的南苑飞机场此时已经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不能留待他们撤离北京的时候使用了。于是他们只好利用位于南城的天坛以及东单牌楼附近一处曾被外国侵略军用作练兵场的空地，匆忙修建了两个临时飞机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推进到北京近郊，控制了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尽力团结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争取让他们能够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而不是追随旧政权前往台湾。

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文学、艺术、教育各界的名人们所做出的选择各不相同。有些人总是往沈从文头上扣一顶“现代评论派”的帽子，只是因为他在这家刊物的办事机构里做过一名发行员，赖以谋生，自然也在这家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现代评论》一开始是由胡适主编的；沈从文成为著名作家以后曾受聘在吴淞中国公学讲授文学创作，而胡适恰好任该校校长，于是有些人就依据这些关系，把沈从文称作“现代评论派”。胡适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从东单临时机场登机飞往台湾；但是沈从文决定继续留在北京——这个选择并不是偶然做出的，沈从文当年就是因为痛恨家乡那些亦军亦匪的地方军阀才来到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在五四运动的熏陶之下，他更增强了爱国主义信念。当年他以鲁迅为楷模，选择了文学创作为终身的事业，希望以他的作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贡献。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但是沈从文却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留下来的。因为早在1946年，从上海到香港，左翼文艺阵营的一些文人就开始发表文章，连篇累牍地对沈从文进行攻击，沈从文时时感到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迟早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面对这些围攻者的骇人气势，沈从文仍然决定留在北京，他的拳拳之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令人遗憾的是，沈从文虽然留了下来，但是他不仅难以继续从事他那种充满地域风情的文学创作，就连已经发表的作品也遭到了始料未及的厄运。